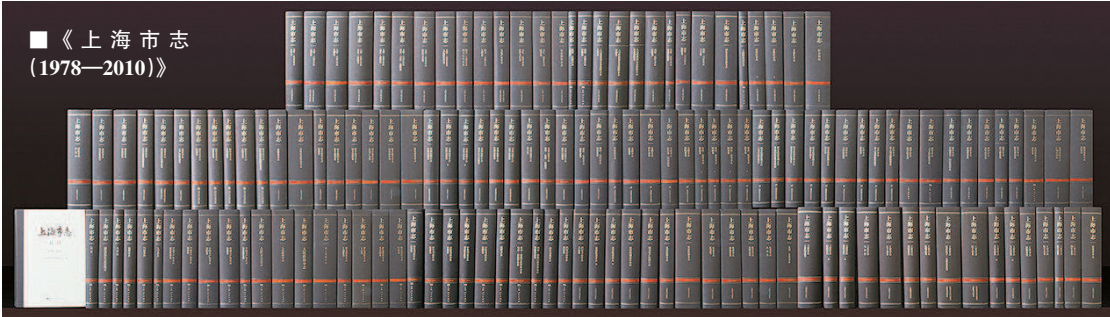


■ 《上海市志  
(1978—2010)》

■ 上海市级专志

国有史,地有志。观地方志,可知“一方的古今总览”,但要修好一部地方志书,对修志人有严格的要求,不仅要有扎实的文字功底、历史阅历,更要有愿意扎根于志书的勇气与耐力。“修志问道,直笔著史”,可谓修志人之精神。

## 人生难得修一志

◆ 丛歌



■ 上海市区县志

万字,读初稿花了三个多月,这三个月里,除了吃饭和睡觉,其他所有的空闲时间,叶供发都在看稿,他说,那三个月看过的稿子,一句都不敢忘。“因为区里各部门间的工作会有交叉、重复,但入志书的内容不能简单地交叉、重复,更不能前后矛盾。我必须记住,初稿中的哪个地方提到过什么内容,才能删改补充。”

审读南京西路综合开发的内容时,叶供发发现,有一段写了1998年区委、区政府利用在建项目闲置场地的“时间差”推进临时商业网点建设的内容,在他看来,搭建一些临时商业网点,不足以入志书,为了控制字数,他把这部分作了删减。

但他没想到,这一删,引起了静安区商务委的四位老同志的注意。那天,四位老同志专程登门拜访他。“发展商业,重点就是人流,是有效人流在这里的消费习惯。”开口的,是80多岁高龄的商业老法师,“当年,决定在这里搭建临时商业网点,就是为了留住有效人流。如果有效人流改变了消费习惯,就算新的商场造好了,他们也不会来消费了。也许那时,他们已经养成了在其他地方的消费习惯。”听到这里,叶供发被感动了,他差点忽视城市更新过程中重要的一笔。“静安区志”最终的定稿是180万字,后来,删去的每个字,叶供发都经过专门的推敲,不懂就问,留下的字,字字珠玑,每个字都有理由。他说:“修志人必须是杂家,修志也得开门,要对历史负责,也要对未来有启迪。”

## 大浪里淘沙

“千淘万漉虽辛苦,吹尽狂沙始到金。”修志人常用唐朝诗人刘禹锡《浪淘沙》中的句子,来形容他们的工作:大浪淘沙,去粗取精,去伪存真,精雕细刻。

季洪昌参加过崇明县的两轮修志。第一轮修志时,他负责收集本部门资料提供给县志编纂委员会办公室。2007年退休后,他即被县志办聘用,参加县志全过程的编写工作。修志不易,但在季洪昌眼里,不易已不是志书写作的体例要求高或不计个人得失方面,这些都是可以学习和克服的。真正的难和苦来自收集资料。由于各种原因,不少部门和乡镇没有按照要求及时提供县志所需资料,或提供的资料质量较差,存在内容不全、分类不清、数据不准等诸多问题。志书编写,要求“横不缺项、纵不断线”,资料是志书编纂的基础,也是方志的本质属性,没有全面、详细、完整的资料,就无法动笔编写资料长编,也就不能保证方志书稿的质量。

走访、开会、泡档案馆成了修志的日常。历经四年时间,崇明县志完成了240万字的编纂任务出版发行。但从编写资料长篇到形成审核稿,反复斟酌、研究、归纳、提炼、修改,每卷每章每节每日修改校核均在10稿以上,有的篇目达20稿,文字的书写总量达1500万字许。回忆这些文字的淘洗,《崇明县志(2005—2016)》总纂袁永达用了辛弃疾的名句:“众里寻他千百度,蓦然回首,那人却在灯火阑珊处。”

历时近12年,在数万名修志人员的辛勤耕耘下,上海市第二轮新编地方志书编纂工作已于2021年完成。十年一剑寻常事,换取鸿篇万古存。今天,我们走近那群默默无闻的修志人。

## 掀起寻根热

档案室是修志人去得最多的地方。那天下午,李红怡和搭档像往常一样,进入上海市第一人民医院的档案室,继续寻找修志资料。档案室是个大宝库,有很多珍贵的古董文物级的资料,每次翻看这些资料,就像和历史对话。在一堆泛黄的档案资料中,李红怡一眼看到一本深蓝色的硬壳书,这本与众不同的封面,让她心中充满了迫不及待。“慢慢翻,别碰坏纸张,一般人是不懂的。”档案室的李静老师在一旁提醒她。这是一本全英文的年报。李红怡的英语底子好,她粗粗一看,发现第一页就详尽记载了1864年建院时,医院的工作情况,还包括租赁租金、对时任医疗总监梅耶(Meyer)医生和护士修女们工作的赞誉。发现新宝贝了,但这是医院唯一一本年报,不能外借。修志团队的小年轻刘星辰灵机一动,把扫描仪请进档案室,将这本文英文年报扫描了下来。

这本英文年报记录的是1864年到1912年医院的详尽介绍,充实了市一医院建院初期的历史情况,在修志团队中掀起了寻根之旅的热潮。张衍颖为了考证最早的院址是在“北苏州路190号”“苏州北路”还是“苏州河北路”花了很多硬功夫。最终,虹口区地方志办公室一张地图为她揭晓了答案……从医院的档案室、人事处、病史室到四川北路洋泾浜教堂、徐家汇天主教堂、犹太人纪念馆、圣伯多禄堂、虹口区档案馆、上海市档案馆、上海市图书馆、上海市委组织部、南京第二历史档案馆等地,市一修志团队的寻根之旅走过很多地方,他们还抓紧时间开展了“老专家抢救工程”,采访85岁以上老领导和老专家。

市一医院接到修志任务是2018年7月,这也是医院成立以来第一次编纂院志,一张白纸,从0起步,编纂的时间跨度从1864年建院至2017年,这对修志人提出了很高的要求。尽管修志辛苦又清苦,但老少结对的他们提出了很多有意思的口号:倒排工期、挂图作战、弯道超车,为了按期在时间节点内完成三审三校的工作,他们制定每日工

作计划,每周工作例会,把握好进度和质量的关系,到处采访、边改边审、挑灯夜战。

“修志的当下,我们觉得很苦,但修完了志书,回忆起那些过程,我记忆中,留下的全是快乐的瞬间。”编纂办公室主任沈静说,修完这部书,她收获了一支团结、坚韧又阳光的团队。修志队伍中,年纪最大的70岁,最小的30岁,院龄最长的42年。

寻根之旅,有苦有甘,有收获也有遗憾。“到目前为止,医院创始人的相关清晰照片依然没找到,这是这次编纂院志留下的最大遗憾。”沈静说,大家原来一直以为1949年前,医院前竖立的一块碑文上篆刻的是医院创始人的姓名,但这次经过考证,大家发现那是纪念将X光引入上海的第一人,是医院当时的董事会主席,并非创始人。后来,在复旦大学历史系高晞教授的指引下,大家走访了洋泾浜教堂、重庆南路天主教堂等多个地方,了解到有《江南传教士》这本书,从这本书中查到了意大利人杜若兰是当时医院筹建资金募集人,终于找到了创始人的“名字”,但照片还在继续考证中。

## 刨根问到底

修志是一门精细活,志书“三审”更如同“千层糕”制作,撰稿、审稿和修改次数都很多。“广电卷”的14位编辑,大多是“退休老兵”,他们说,“千层糕”的每一层,都是趋向更充实、精炼,更凸显事物的本真。

“广电卷”第51页的彩图有一张“建台元老”的合影,前排左起第一人,原来的标注是黄允。负责图照的路世贵感觉有误,他问了不少老同事,都无果。冯乔一看,揭晓出了谜底,照片上的人物是宣布上海电视台开播的首播播音员杨慧茵。在拍摄电视台建台40周年纪录片时,冯乔恰好采访过她。类似这样纠错、释疑的例子有很多,是因为编辑室除了三审制,还坚持了集体审稿讨论和微信群内及时交流的机制。开始修志后,路世贵养成了随手记的习惯,只要想起与工作有关的人和事,无论白天黑夜甚至凌晨,他都会起床提笔。路世贵负责“大事记”部分,他给自己定下规矩,每一条大事记必须有准确无误的时间日期。本着“大事不漏”的原则,他补充了1980年至1998年大事记104条,删掉百余条。共计1509条大事记,真实记录了上海广播电视系统33年改革发展的历程。

## 求教老同志

修志离不开老同志的支持,这是修志人的共识。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分志编委会副主任,编纂室主任鲍淡如曾分管社会保险工作。“社会保险”部分他拿手,但编写人事卷时,就觉得心中没了底气。要书写历史,必须找到经历过历史、能讲述历史的那个人。鲍淡如想到了老局长石涛。1982年,石涛就担任了人事局的副局长,1983年至1991年任人事局局长,请他来回忆这段历史,是最合适的。不过老局长已90岁高龄,住在医院里,这让鲍淡如有了顾虑,会打扰老局长影响他的身体健康吗?令大家欣慰的是,经过联系,石局长爽快地答应了。鲍淡如和编纂室的同事前往拜访时,老局长在院借好了会议室。老局长思路清晰,讲述了他曾组织的万人大调查,形成的调查报告里在全国首次提出了“人才市场”的概念,为解决人才流动、人尽其才创造了条件,也为人事工作的后续改革打下了基础。后来,编纂室的同志还拜访了原劳动工资委员会副主任兼办公室主任、上海社会保险委员会副主任胡逢云,他曾参与上海养老保险制度设计,把他自己多年来撰写的研究报告和发表的文章180余页,全交给了编纂室。

上海市劳动和社会保障局承担了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分志(社会保险卷、人事卷、劳动卷)的编纂任务,但编纂室只有十几人。平均每卷志书由四个人负责。出版时三卷志书共350余万字,每个人有近30万字的编纂工作量。除了修志,编纂室最后还用收集的材料,编写了两本口述实录:口述上海社会保障改革、口述上海人力资源社会保障改革。

## 修志有宝典

华东政法大学的校志编纂工作组有一本自编宝典——编纂工作培训手册。2016年3月,王立民教授接手编纂工作组组长,上任后的第一件事,就是修订编纂宝典。从编志的各种精神到行文规范到资料长编怎么做,从电子资料卡片的模板到校志编纂的流程、篇目结构以及编纂规划等,一应俱全。后来,也有同行来取经,带走的,就是这本宝典。

上海市的第二轮修志,也是华政历史上的首次修志。付晓是华政编纂工作组中唯一的专职编纂人员。在校志即将交付印刷前半个月,他连续奋战,乘坐轨交时也在读稿,通宵工作是日常。他累出心脏早搏,最严

重时,24小时早搏次数2.5万次。轻伤不下火线,这是付晓给自己下的命令。沉浸在修志中的他,也顾不上家人,父亲肺癌复发来沪手术,他只能偶尔陪护;女儿患上了眼疾,多家三甲医院查不出病因,都是家人四处寻医,他也只是抽空去医院看看。好在家人的支持,是他修志最强的后盾。

华政建校60多年,三起两落的坎坷办学经历,造成了档案的不完整,这让撰写校志总述的副组长肖庆平有点头疼,要宏观地叙述学校半个多世纪的发展脉络,厘清学校六十多年的成长轨迹,需要高屋建瓴的视野和庖丁解牛的细腻。他思考了很久,当顺时针思考搁浅时,就溯流而上,慢慢地在点点滴滴中,刻画出了清晰的图案。

华政的编纂工作组每周要开一次例会,岳川夫、张令高、顾伟民、张亚萍、彭国云等成员都积极参加。6年开了170多次会,每周总结、解决难题,会后把主要内容在学校内网“校志专栏”中公布。这样全校180多位主要编纂人员也养成了习惯,每周总要去看看“校志专栏”。

校志在2021年7月终于杀青,交付出版,但编纂之余也留下了几个未解之谜,入校园宿舍楼钟鼓楼底座的建筑,有一层风格明显与众不同,参照老照片,这一层应该是后来为提升钟鼓楼而加进去的,那么是谁改建提升了钟鼓楼?为何改建?这些问题至今仍萦绕在1979年进校读书的肖庆平的心中,“我刚进校读书时,宿舍楼的大钟是停摆的,后来经过维修,校园又回荡起悠扬的钟声,根据当时《华政报》的报道,推算大钟的停摆时间应该是在1958年,而此时华政撤校,学校并没有改建钟鼓楼的必要,也就没有这方面的档案记载;查阅其他部门的档案也没有新发现。”还有关于宿舍楼前的牌坊拆除时间,现在的记载为1954年,可编纂工作组收集到的1958年学生毕业集体照,其背景宿舍楼前的牌坊赫然在目……不过,编纂工作组的成员们认定,这些疑问一定会在将来的考证中,慢慢解开。

## 对历史负责

2008年到2015年,静安区的地方志修了7年,当区志总纂叶供发完成最后一校,合上电脑时,不禁感叹:人生难得修一志,七年修志,七载春秋,30多年的职业生涯中的五分之一交给了修志,尽管累,但很值。

修志是技术活,也是体力活。作为总纂,他收到的初稿有300多